

司马越与永嘉之乱

陈 苏 镇

“永嘉之乱”是西晋历史上继八王之乱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战乱，是刘渊、石勒等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攻陷洛阳，横扫中原，从而彻底摧毁西晋王朝，使中国历史再次由统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东海王司马越原是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者和永嘉时期西晋朝廷的实际秉政者。

导致永嘉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而迅速衰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崛起并迅速发展，各地流民起义不断爆发等等。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但司马越秉政后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由此引起的西晋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在这些矛盾冲突中西晋王朝的进一步衰弱和瓦解，作为其原因之一，似乎被忽略了。本文将对此试加探讨，以求对永嘉之乱有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

司马越在平定了八王之乱控制了朝廷大权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鸩杀惠帝，拥立怀帝。《晋书·惠帝纪》：光熙元年十一月，帝“因食饼中毒而崩，或云司马越之鸩。”凶手究竟是谁，史无明文。“司马越之鸩”只是传闻^①，但不无根据。首先，司马越此时刚刚秉政，立足未稳，必对惠帝严加控制。若非他所指示或未经他同意，恐无人能亦无人敢做此大事。其次，皇帝中毒而亡，非同一般。司马越若非凶手，定要大兴缉查，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至少也会有所表示，以避免人们对他的怀疑。而事实上他对缉查凶手之事竟只字不提。这种不合情理的沉默恐是心虚的表现。

惠帝死后，在由谁即位问题上又有一番斗争。当时，具备即位资格的有两人，前太子清河王覃和皇太弟炽（即怀帝）。惠帝刚死，羊皇后催清河王覃入，欲立之。侍中华混“露版驰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宫。后已召覃至尚书阁，疑变，托疾而返。”（《资治通鉴》八十六）怀帝遂即位。永嘉元年正月，清河王覃舅、司马越之姑子周穆与其妹夫诸葛玫说越曰：“主上之为太弟，张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为群凶所废。……公盍思伊霍之举，以宁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岂宜言邪？”叱左右斩之（《晋书·东海王越传》）。十二月，“前北军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尉陈颜等谋立覃为太子，事觉，”未果（同上《清河王覃传》）。司马越“恐清河王覃终为储副，矫诏收付金墉城，寻害之。”（同上《东海王越传》）

从惠帝、清河王覃和怀帝当时的情况看，惠帝是白痴，即位后始终是傀儡；覃年仅十二^②，自然也不能亲理朝政；怀帝则已二十三岁^③，正当血气方刚之年，且自少“专玩史籍，有誉于时”，立为太弟后，又“恂恂谦损，接引朝士”（同上《怀帝纪》）。显然，对司马越来说，惠帝和覃都比怀帝更容易驾御。那么，司马越为何要杀死惠帝又一再阻拦覃即位而坚持拥立怀帝呢？这一问题既是确认司马越为凶手所不可缺少的根据，也是揭示这一事件之真实背景的关键所在。我认为，司马越操纵此事的目的是要解决八王之乱后期遗留下来的惠帝羊皇后问题。

羊后出自西晋名门泰山羊氏，赵王伦秉政时立为皇后，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执政时逐渐卷入政治斗争。当时，宗室诸王继外戚杨、贾之后，群起混战，相继专权，政治动乱有增无

已。于是，在一部分庶姓大臣和禁军将领中逐渐形成一支反对宗王专权的政治势力。特别在颖、颙执政期间，颖在鄴城“悬执朝政”^①，颙在长安挟主专权，这支势力在洛阳的活动更加活跃。而羊后便成了他们反对颖、颙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颖、颙打击的对象，因而曾五经废立。

第一次，永兴元年二月，颖、颙讨长沙王乂，乂败，颖“奏废后为庶人，处金墉城。”

《《晋书·惠羊皇后传》》七月，右卫将军陈旌等奉帝讨颖，“复皇后羊氏”（同上《惠帝纪》）。

第二次，八月，颙将张方救颖，入洛阳，“废皇后羊氏”。十一月，张方逼迁惠帝至长安，洛阳留台“复皇后羊氏”（同上）。

第三次，永兴二年四月，“张方废皇后羊氏”（同上）。时颙遣兵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遣养子昌请教于东海王越，越……不肯出兵。昌乃与故殿中人杨篇诈称越命，迎羊后于金墉城，入宫，以后令发兵讨张方，奉迎大驾。”（同上《皇甫重传》）

第四次，昌以后令发兵，“事起仓卒，百官初皆从之，俄而又共诛昌”。^⑤（同上），羊后当亦被废。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平西”乃四平将军之一。长安在西，周权自称平西，当是讨颙之意），复皇后羊氏。”（同上《惠帝纪》）

第五次，“洛阳令何乔攻权，杀之，复废皇后。”光熙元年六月，司马越迎惠帝返洛，“复皇后羊氏”^⑥（同上）。

颖执政后，长沙王乂是他专权的主要障碍，而后父羊玄之任尚书右仆射，加侍中，“恃宠作祸”^⑦，羊后此时可能也开始干预朝政。故颖、颙伐乂，“以讨玄之为名”，玄之“忧惧而卒”^⑧，羊后亦被废黜。及颙在长安挟天子令天下，洛阳反颙势力在政治上进一步陷入被动，因而三次复羊后位，皇甫昌甚至公然以后令发兵讨颙，试图利用羊后的影响和号召力摆脱被动局面。

颙以羊后“屡为奸人所立”，曾矫诏“敕留台赐后死”。“诏书累至”，留台大臣刘噉、荀藩、周馥等皆不奉诏，且上表警告颙曰：“臣按古今书籍，亡国破家，毁丧宗祏，皆由犯众违人之所致也。……而大使卒至，赫然执药，当诣金墉，内外震动，谓非圣意。……人心一愤，易致兴动。……杀一枯穷之人而令天下伤惨，臣惧凶竖乘间，妄生变故。臣忝司京辇，观察众心，实以深忧，宜当含忍。……勿令远近疑惑，取谤天下。”颙见表大怒，遣人东收刘噉，但终于未敢对羊后下手^⑨。

可见，八王之乱后期，羊后问题已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对颖、颙来说，羊后不仅是个明显的威胁，而且相当棘手，废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杀之则会导致更大危机。而羊后本人历经磨难，“实不思生”^⑩，对宗王专权深感忧惧。惠帝死后羊后试图拥清河王覃抢先即位一事，则表明她并非甘于寂寞、任人摆布之人。同时，出于对刘噉等人救命之恩的感激，她曾特意遣使谢噉曰：“赖刘司隶忠诚之志，得有今日”（同上《刘噉传》），与反宗王专权势力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因此，司马越秉政后，羊后既大难不死得以复位，定会尽力维护皇权以保护自己，对朝政的干预和对专权者的抵制势必进一步加强。当时，由于司马越不臣之迹未显，羊后未与之发生明显冲突。但司马越既要专权，羊后便是潜在的威胁，是必须首先加以扫除的一大障碍，而为了避免将自己置于颖、颙之列从而招至激烈反对，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暗杀惠帝，以此解除羊后以皇后身份干预朝政的可能性。然惠帝死后，若清河王覃即位，羊后便是太后，司马越仍然不能达到目的。若怀帝即位，羊后与怀帝“为嫂叔”，则“不得称太后”^⑪。所以司马

越必须立怀帝。

就此办法之可行性而言,暗杀皇帝当然要冒风险,但惠帝无能已是天下共知,长期战乱早已使他失去了臣民的信赖。杀之而立怀帝,表面上似是废昏立明之举,因而不致激起轩然大波。事实上惠帝之死也的确没有引起很大震动。就其利弊得失而言,怀帝固然不如惠帝和覃容易驾御。但他自“宗室构祸”以来,“冲素自守,门绝宾游,不交世事”,立为太弟后,虽“恂恂谦损,接引朝士”^⑬,毕竟未曾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其母王氏,“不知所出”^⑭,恐出身微贱,其妻梁氏,《晋书》无传,当亦非高门。更重要的是,他得以立为太弟是靠河间王颙之力,而司马越执政后,河间王颙已败,朝中尽皆反颙势力。因此,怀帝当时在朝中的根基和影响都不及羊后,司马越完全有可能认为他比羊后容易对付。至于怀帝即位后的表现,则是司马越始料难及的。

以上所述可以证明司马越有鸩杀惠帝的动机,因而可进一步证实“司马越之鸩”的传闻。而司马越通过这一事件,一方面成功地解决了羊后问题,使之只能以“惠皇后”名义“居弘训宫”^⑮,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设置了怀帝这一新的障碍。于是,司马越与怀帝又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使刚刚摆脱了八王之乱尚喘息未定的西晋王朝再次卷入激烈的内部冲突之中。

怀帝初即位,“委政于越”,不久即“始亲万机,留心庶事”^⑯,“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⑰。

又恶越“威权自己”,而“力不能讨”,遂开始发展亲信势力,以缪播、缪胤兄弟“有公辅之量,又尽忠于国,故委以心膂”,使与“帝舅王延、尚书何绥、太史令高堂冲并参机密”^⑱。一时,皇权颇有复振之势。司马越“选用表请,尚书犹以旧制裁之”^⑲。以至黄门侍郎傅宣叹曰:“今日复见武帝之世矣!”^⑳

面对这种局面,司马越已无退路,遂撕下忠臣面具,公然挟主专权。其步骤是首先经营地方州镇,特别是洛阳周围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以控制整个局势,然后解决洛阳问题。

永嘉元年三月,司马越“出镇许昌”。同时以弟略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腾为安北将军、都督司冀二州诸军事,镇鄴;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诸军事,镇长安;七月,又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鄴(《晋书·怀帝纪》)。除宗室兄弟外,王衍等士族名士也是司马越依靠的重要力量。惠帝末年,司马越用王衍谋,以王澄为荆州刺史,王敦为青州刺史^㉑。后又迁敦为扬州刺史^㉒。王导曾为越府参军,与司马睿“素相亲善”。睿“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及徙镇建鄴,导亦从之^㉓。永嘉三年,司马略薨,越又以名士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㉔。

司马越最顾忌的地方将领是镇东将军、扬州都督周馥和兖州刺史荀晞。“馥自经世故,每欲维正朝廷,忠情恳至。以东海王越不尽臣节,每言论厉然,越深惮之。”^㉕越自镇许昌,又以琅邪王睿镇建鄴,目的之一恐即防范周馥。荀晞与越初无嫌隙。永嘉元年五月,马牧帅汲桑等攻陷鄴城,杀司马腾^㉖。越以晞为前锋讨之,破桑定鄴而还。越“甚德之,引升堂,结为兄弟。”^㉗后,越司马潘滔等说越曰:“兖州要冲,魏以之辅相汉室。荀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越以为然,乃厚晞名号,迁于青州^㉘,而自“领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徙屯鄆城。“由是与晞有隙”。^㉙

司马越既以亲党尽据天下要害,遂于永嘉三年三月率众返回洛阳,用左长史刘舆之谋^㉚,“勤兵入宫,于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余人,并害之。”(《晋书·怀帝纪》)“又以顷

兴事多由殷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由是出者略尽”，而以“（东海）国兵数百人宿卫。”（同上《东海王越传》）时刘噉为尚书仆射，“越惮噉久居监司，又为众情所归，乃以为右光禄大夫、领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外示崇进，实夺其权。”（同上《刘噉传》）至此，司马越牢牢控制了怀帝，大大加强了其的专权地位。

但是，由于司马越忙于内部经营，无暇顾及刘渊、石勒势力的发展，没有从战略上充分考虑他们对西晋，特别是对洛阳日益增长的威胁，因此，在他打击怀帝并取得成功之时，以洛阳为中心的整个战略形势却迅速恶化，形成危机四伏的局面。

刘渊于永兴元年起兵反晋，建立汉政权，至永嘉元年，众不过十万左右^③，占地仅并州西南一角^④，所谓“颢守偏方，王威未震”。而此后，他乘司马越与怀帝相争之机，公然以洛阳为目标，率众南下，“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上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氐酋大单征、东莱王弥及石勒等并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刘渊实力大增，遂于永嘉二年称帝改元，并将都城南迁平阳，进一步向洛阳逼进。

（《晋书·刘元海载记》）

石勒原为汲桑部将，被苟晞击败后，奔上党投胡部大张匄督、冯莫突等，遂说之归刘渊。渊“署匄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使石勒“统之”。“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于渊，奔伏利度，结为兄弟，渐使“诸胡畏服”，众心附己，“因会执伏利度”，率其众归刘渊。渊“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命勒向东发展。勒遂“率所统七千为前锋都督”，攻陷壶关，又与刘零等七将率众三万东越太行，寇魏郡、顿丘、赵郡、巨鹿、常山等地。“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同上《石勒载记》上）。

至永嘉三年司马越返回洛阳时，刘渊、石勒已分别在河东、河北打开了局面，对洛阳形成钳击之势。而司马越在打击怀帝的过程中，又在西晋内部特别是洛阳后方留下了一系列隐患。

首先，司马越在外围重镇用非其人，使之无法发挥对洛阳的战略支撑作用。司马腾“性俭嗇”，“鄴中虽府库虚竭，而腾资用甚饶”。但他“无所振惠，临急，乃赐将士米可数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为用”。汲桑、李丰等寇鄴，“腾不能守，率轻骑而走，为丰所害。”（《晋书·新蔡王腾传》）苟晞破汲桑，司马越以和郁镇鄴。永嘉二年，石勒寇赵郡，和郁望风而逃，勒遂陷鄴^⑤。自此，魏郡一带成了石勒活动的基地。司马模至长安后，“关中饥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病，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司马越表征模为司空，欲以中书监傅祗代之。模恐“不能绥抚而还”，“于声望有亏”，又恐与越并在朝廷，“自强则有专权之罪，弱则受制于人”，遂“不就征”（同上《南阳王模传》）。襄阳原由刘弘督守，“弘每有兴发，手书守相，丁宁款密，所以人皆感悦，争赴之”。司马略至襄阳，“寇盗不禁”，遂以弘子璠为顺阳内史，“江汉之间翕然归心”，尚可维持安定局面。及山简镇襄阳，“知璠得众心，恐百姓逼以为主，表陈之，由是征璠为越骑校尉”（同上《刘弘传》）。而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⑥荆州刺史王澄亦“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⑦由此“南夏遂乱”（同上）。

琅邪王睿“初镇江东，威名未著”，经王导、王敦“同心翼戴”^⑧，很快使“吴会风靡，百姓归心”，从而站住了脚跟，使江东成为比较稳定的地区。但睿、导等人对司马越早有二心。镇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司马睿），潜有兴复之志”。睿在洛阳，“导每劝令之国”^⑨。睿徙镇建鄴，亦为“王导计”^⑩。《晋书·华轶传》载：轶为江州刺史，“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祇承元帝敕命。郡县多谏之，轶不纳，曰：‘吾欲见诏书耳’。”睿遂

遣军“屯彭泽以备軼”。由此“粗有嫌隙”。可见，“洛京尚存”之时，司马睿与王导即已开始另立中心。因此江东对洛阳的实际支撑力也相当弱。

其次，洛阳当时北对刘渊、石勒，西面的关中饥馑残破，粮草来源只能依靠东南各州。其中扬州地处长江下游富庶地区，更是洛阳的主要粮食基地。赵王伦篡位时，诸王举兵讨伦，“久屯不散，京师仓廩空虚”。尚书仓部令史陈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遂遣敏东出筹粮。此后，洛阳粮草供应当主要依靠陈敏。故司马越称敏“建谋富国，则有大漕之勋”（《晋书·陈敏传》）。永嘉元年九月，晋廷“修千金竭于许昌以通运”，^③正是为了进一步疏通东南粮道。

东南各州既是洛阳的经济命脉，许昌重镇及兖、豫二州作为洛阳的东南门户，便恰似西晋朝廷的咽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司马越秉政之初，司马模镇许昌，荀晞驻鄆城，皆有重兵。但永嘉元年三月，越迁模于关中，自镇许昌；二年三月，又迁荀晞于青州，自屯鄆城；三年三月，又率众返回洛阳。结果造成许昌兵力空虚，兖、豫二州守备薄弱的局面。越刚至兖州，王弥即攻“入许昌，诸郡守将皆奔走”。越返洛阳后，石勒又袭鄆城，败兖州刺史袁孚（《晋书·怀帝纪》）。

最后，司马越信用潘滔、刘舆等奸佞小人，“人士多为所构”^④，又猜嫌排挤周馥、荀晞、刘暉等大臣，公然收杀王延、缪播等怀帝近臣，“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因而“大失众望”，日益陷入孤立境地。

司马越返洛清君侧后，西晋内外局势已空前恶化，但尚未发生根本转变。刘渊、石勒虽已跨有太行两侧，活动空间仍嫌狭小，难以长期立足，而继续向外扩张又遇到困难。永嘉三年八月，刘渊遣刘聪、王弥等进攻洛阳^⑤。“聪等长驱至宜阳，……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⑥。十月，渊“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⑦。聪等直逼洛阳城下，呼延翼“为其下所杀，其众自大阳溃归”。聪两战失利，“粮食不支数日”^⑧，渊遂“召聪等还师”^⑨。刘渊两攻洛阳不克，南进受阻。向北发展又在并州、幽州一线遇到晋将刘琨、王浚的抵抗。刘琨初任并州刺史，“并土饥荒，……余户不满二万。”琨北依鲜卑，“抚循劳徠”，渐使“流人稍复”。又遣人离间刘渊部下“杂虏”，“降者万余落”，刘渊“甚惧”。永嘉三年四月^⑩，晋上党太守襄醇降刘聪，雁门乌丸复反，琨亲率精兵讨之。刘聪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虚袭并州治所晋阳。琨引鲜卑猗卢“并力攻粲，大败之，死者十五六”^⑪。王浚在幽州亦“结好”鲜卑，控御一方，“声实益盛”^⑫。永嘉三年九月，石勒寇常山，“浚使其将祁弘帅鲜卑段务尘等十余万骑讨勒，大败勒于飞龙山，死者万余”^⑬。刘渊西面还有关中、陇右晋军的牵制。永嘉二年五月，王弥寇洛阳，凉州刺史张轨遣北宫纯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⑭。永嘉三年八月，刘聪等进攻洛阳，司马模亦曾遣军“自长安讨之”^⑮。

从北方形势看，西晋此时仍未失战略主动，若能及时进剿，则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但司马越每因内部矛盾重重而心“不自安”，“疑朝臣贰己”，“多有猜嫌”^⑯，故仍无心北讨。永嘉四年，刘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请出兵共讨刘聪、石勒；越忌荀晞”等人，“恐为后患，不许”^⑰。

司马越按兵不动，坐失机会。刘渊、石勒等却在积极设法扭转局面。永嘉三年十一月，刘聪第二次攻打洛阳失败后，王弥劝聪还师，同时建议：“下官当于兖、豫之间收兵积谷，

伏听严期。”（《晋书·刘元海载记》）提出了南下兖、豫之间发展力量实现割据的策略。

如前述，许昌此时已无重兵，兖、豫二州守备薄弱。而王弥出身汉族官僚家庭，“家世二千石”，祖父王頎曾任汝南太守，王弥自己曾“游侠京都”，又曾“寇泰山、鲁国、譙、梁、陈、汝南、颍川、襄城诸郡，入许昌，开府库，取器械，所在陷没，多杀守令”，在这一地区有一定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能够利用当地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反晋旗号赢得流民势力的支持。因此，王弥南下后，“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吏以应弥，”很快便打开了局面。此后，王弥屯驻阳翟，遣兵寇陈郡、颍川及徐、兖地区（《晋书·王弥传》）。

王弥割据“兖、豫之间”，切断了洛阳东南粮道，仅一年便使洛阳爆发了粮食危机。《晋书·怀帝纪》：永嘉四年十月，“京师饥”。光祿傅祗、太常挚虞遗凉州刺史张轨书，“告京师饥匱”^④。周馥上书建议迁都时也说：“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⑤。与此同时，汉主刘聪（刘渊已死，刘聪即位）也看出王弥南下的意义，遣刘粲、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不攻洛阳，而“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⑥。随后，石勒也渡河南下，攻克襄城、襄阳，“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王弥的割据。

王弥南下策略的实现，击中了西晋的致命弱点。此时，司马越要维持对黄河以南地区的控制，必须保住洛阳，因而必须动员各地军队，特别是东、南州镇的力量，剿灭南下汉军，使“以东诸州职贡流通”^⑧。而这又势必进一步暴露出西晋内部的弱点和矛盾。于是，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永嘉四年十月，司马越“羽檄征天下兵”。怀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然而“莫有至者”（《晋书·怀帝纪》）。征南将军山简自襄阳遣军赴难，至湓阳，为王如等流民军所破，简遂“婴城自守”^⑨。荆洲刺史王澄自江陵率师北上，“先锋至宜城”，闻山简已败，“散众而还”^⑩。此外，唯江州刺史华軼遣三千兵屯夏口，“以为声援”^⑪，其他州镇皆无动静。

司马越征兵不至，不得不亲自出马，“镇集兖、豫”^⑫，遂率行台及甲士四万出屯于项。这样一来他对朝廷的控制便有所放松。于是，怀帝与大臣中反对司马越的势力迅速活跃起来。

首先，周馥“不先白于越，而直上书”，建议怀帝迁都寿春。书中提到：“臣谨选精卒三万，奉迎皇驾。辄檄前北中郎将裴宪行使持节、监豫州诸军事、东中郎将，风驰即路。……令王浚、荀晞共平河朔，……皇舆来巡，臣宜转据江州，以恢王略。”（《晋书·周馥传》）周馥此议不只是为了挽救西晋王朝，还隐含着乘机削弱司马越对朝廷大权的控制，从而扭转西晋内部政局的用意。按周馥的计划，怀帝迁都后，寿春便是全国政治中心，而馥据江州，裴宪据豫州，荀晞据青州、兖州，围绕寿春形成一道防线，对外可抵御汉军，对内则可威慑寿春。这样便能使朝廷跳出司马越及其亲党所控制的以洛阳为中心的战略格局，从而使周馥等人能对朝廷事务施加更大的影响。显然，这一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司马越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因此，司马越得知此事后“大怒”，遣军讨馥。不久，馥众溃被拘，“忧愤发病卒”^⑬。

周馥之谋未成，荀晞遂公开向司马越发难，昌言：“司马元超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乱，……今将诛国贼，尊王室，桓文岂远哉！”又“移告诸州，称己功伐，陈越罪状”。怀

帝“恶越专权”，乃诏荀晞，“委以关东，督统诸军”，“又密诏晞讨越”。晞遂“部分诸军，遣王讚率陈午等将兵诣项”。司马越“疑晞与帝有谋，使游骑于成臯间，获晞使，果得诏令及朝廷书”，遂“下檄说晞罪恶”，遣军讨晞（《晋书·荀晞传》）。

此时西晋已是“公私罄乏，所在寇乱，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①，司马越非但无力挽回西晋危局，且自身难保，终于“忧惧成疾”^②，永嘉五年三月，薨于项。

司马越死后，怀帝一时来不及重整旗鼓，西晋王朝顿时陷入瘫痪状态。于是，刘聪、石勒等抓住战机，横扫晋军。永嘉五年四月，石勒追及越丧于苦县宁平，围而歼之，“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③。随后，刘聪遣呼延宴将“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命王弥、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六月，攻克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俘怀帝至平阳^④。八月，刘粲“攻陷长安，……南阳王模遇害。”九月，“石勒袭阳夏”，荀晞“没于贼”。十月，“勒寇豫州诸郡，至江而还”^⑤。很快消灭了黄河一线的晋军主力。至此，西晋败局已定，南北分裂之势已成。

总之，在永嘉之乱这一历史悲剧中，西晋王朝在八王之乱平息后又因内部矛盾和冲突进一步衰弱和瓦解的过程，是不应忽略的重要情节，而司马越作为其中的主角则是应予充分注意的人物。

注①当时还有另一种说法。《晋书·东海王越传》载周穆、诸葛政言曰：“先帝（指惠帝）暴崩，多疑东宫（指怀帝）”。怀帝当时身为皇储，惠帝一死，便可即位。故不能排除他有参与此事的可能性。但怀帝当时的权势和力量远不及司马越，不可能越过司马越操纵此事，因而决非主谋。

②《晋书·怀帝纪》：覃死于永嘉二年二月。同书《清河王覃传》：覃“被害，时年十四”。光熙元年当十二岁。

③《晋书·怀帝纪》：永嘉七年正月，“帝遇弑，……时年三十。”光熙元年当二十三岁。

④《晋书·成都王颖传》。

⑤《晋书·惠帝纪》无此事。《皇甫重传》不载年月。《资治通鉴》八十六系此事于永兴二年四月，“张方废羊后”条后。今从之。

⑥《晋书·惠羊皇后传》：“帝还洛，迎后复位。后洛阳令何乔又废后。及张方首至，其日复后位”。案《惠帝纪》、《张方传》、《河间王颙传》、《东海王越传》，惠帝返洛后，羊后不曾被废，张方之死则在惠帝返洛前。《惠羊皇后传》必有误，不取。

⑦成都王颖语，见《晋书·长沙王乂传》。

⑧《晋书·羊玄之传》。

⑨⑩⑪《晋书·惠羊皇后传》。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⑬《晋书·怀王皇太后传》。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⑰《晋书·缪播传》。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㉑《晋书·王衍传》。

㉒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㉓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②③《南齐书·文学·贾渊传》载：司马越曾将女儿嫁荀晞之子。（《南史·文学·贾希镜传》同）其事当亦在此时。

②⑦《晋书·荀晞传》。

②⑧见《晋书·刘舆传》。

②⑨③④⑤⑥《晋书·刘元海载记》：渊初反“众已五万”，迁都左国城，“远人归附者数万”。

③①《资治通鉴》八十五：刘渊“遣刘曜寇太原，取兹氏、屯留、长子、中都”，遣“乔晞寇西河，取介休”。

③②③③《晋书·山简传》。

③④《晋书·王澄传》。

③⑤《晋书·元帝纪》。

③⑥《晋书·庾敳传》。

③⑦③⑧《资治通鉴》八十七。

③⑨《晋书·怀帝纪》作“九月”，误。今从《资治通鉴》八十七。

③⑩《晋书·怀帝纪》系于七月。今从《资治通鉴》八十七。

③⑪《晋书·刘琨传》。

③⑫《晋书·王浚传》。

③⑬《晋书·怀帝纪》、《石勒载记》上。

③⑭③⑮《晋书·张轨传》。

③⑯同③⑰。原文为“越忌荀晞及豫州刺史冯嵩”。《考异》引琨《与丞相笺》曰：越“更忧荀晞、冯嵩之徒”。当即《通鉴》所据。但《晋书》载，冯嵩初为越从弟司马斌长史，曾与斌等“刑白马啗血而盟，推东海王越为盟主”（《范阳王斌传》）。后为越弟模、腾部将（见《卢志传》、《石勒载记》上）。越自许昌徙屯野城时，以嵩为豫州刺史，委以要害之地，屯屯项城，又以嵩为左司马（见《东海王越传》）。然则冯嵩似是司马越信重之人，越无“忌”之之理。此事无从确考，暂不取。

③⑰③⑱《晋书·刘聪载记》。

③⑲《晋书·石勒载记》上。

③⑳同③⑱。《晋书·怀帝纪》系此事于永嘉四年九月，司马越羽檄征兵之前。《资治通鉴》八十七系于十月，越羽檄征兵后。若无越檄，简、澄不会有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当以《通鉴》为是。

③⑲③⑳《晋书·华轶传》。

③㉑同③⑲、③⑳。